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中华学术精品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顾颉刚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顾颉刚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中华学术精品)

ISBN 7-101-03603-1

I.中… II.顾… III.中国—上古史—研究

IV.K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640 号

原版责编:瞿剑 骅宇蹇

新版责编:陈志刚

中华学术精品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顾颉刚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90 × 1168 毫米 1/32 · 11 1/2 印张 · 246 千字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新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28.00 元

ISBN 7-101-03603-1/K·1515

前 言

一九二九年九月，顾颉刚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学系教授，开“中国上古史研究”课。这个课程讲了两个学期，从这年十月讲起，到第二年六月讲毕。《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就是这一时期所编的讲稿。这部《讲义》的编写经过，他在《自序》中讲了的，这里就不再重复，而仅补充一些他处与《讲义》有关的记载，让读者对此书有更多的了解。

顾颉刚先生认为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中所载的古史都是传说，其中“糅杂了许多非历史的成分”，但二千多年来却一直公认这些传说为古代史实。因此他立志要把它一个一个推翻，恢复它的传说原貌。一九二三年，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时，就想把传说中的古史，一部书一部书地弄清楚，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说：“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设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地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个月做一篇文章，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可见一部书一部书地考辨古史传说，是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时就有的想法，但在以后

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能实现。到燕京之后借着讲课的机会才把它做出来。因此这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实际上就是一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但他并不是只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一部书一部书地把其中的古史传说孤立地考证它产生的时代，而是进一步用历史进化论的方法探索这些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承前启后的演变过程，以证明二千多年来公认的古代史实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史传说演变而成的，所以他说：“我编辑这份讲义的宗旨，期于一反前人的成法，不说哪一个是，哪一个非，而只就它们的发生时代的先后寻出它们的承前启后的痕迹来，又就它们的发生时代背景求出它们的异军突起的原因来。我不想取什么，丢什么，我只想看一看这一方面的史说在这二三千年之中曾起过什么样的变动。《老子》云‘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又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这便是我使用的方法。我想，待到它们的来源和变动都给我们知道了之后，于是它们在史实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推翻，而在传说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建设了。这是我的研究这学问的大目的，而这编讲义乃是个造房屋的草图。”（《自序》一）既然这些公认的古史事实都是传说，就不存在“哪一个是，哪一个非”的问题，也不存在“取什么，丢什么”的问题；而只有实事求是地寻出“它们的来源和变动”，而每一个传说的来源和演变一弄清楚，也就自然地推翻了它的史实假象，而显露出传说的真相。因此，这部《讲义》是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提出之后，“收集本证旁证，一一加以说明”，以坚读者“诸君之信”的奠基之作。

一九三〇年八月，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说道：“现在我很想在《古史辨》之外更作两部书，一是《古史材料集》，一是《古史考》。《材料集》是把所有的材料搜集来，分类分时编辑，见

出各类和各时代中包孕的问题；《古史考》则提出若干较大的问题，作为系统的研究。这是足以使得古史的材料及辩论都系统化的；不过这两部书的完工很不容易，恐怕要迁延到我的垂老之年吧！”在这里，他说了要作《古史考》，对若干较大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而没有具体说出哪些问题，也没有跟编写这部《讲义》联系起来。但到一九三三年，顾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谈到《古史考》时则具体说了要编写《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个考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则是在编写《讲义》时想出来的。顾先生这部《讲义》，最初拟分作三编：甲编——旧系统的古史；乙编——新旧史料的评论；丙编——新系统的古史。后来看到陆懋德的《中国上古史讲义》，类于他拟编的丙编，于是拟专讲旧系统，去掉丙编，以乙编中评论旧史料的话合于甲编，另以三代制度史作为乙编，分为二编：甲编——三皇、五帝的来源，简名为《帝系考》；乙编——三代制度的来源，简名为《王制考》。可是，在编写这部《讲义》的过程中，他对古史传说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对考辨旧系统的古史想法也更为全面而严密，于是又增加了《道统》、《经学》两考，并把这四考合称为《古史考》。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说道：“可是不幸得很，编了一年，甲编尚未编完，更说不到乙、丙两编。所以然者何？只因旧系统方面，我想编四个考：一、辨古代帝王系统及年历、事迹，称之为《帝系考》。二、辨三代的文物制度的由来与其异同，称之为《王制考》。三、辨帝王的心传及圣贤的学派；称之为《道统考》。四、辨经书的构成及经学的演变，称之为《经学考》。这四种，我深信为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我们所要破坏的伪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寿命。我很想作成之后合为《古史考》，与载零碎文字的《古史辨》相辅而行。可是一件事情，计划容易，实做甚难。《帝系》、《道统》两考比较还简单；而《王制》和《经学》的内涵则复杂

万状,非隐居十载简直无从下手。因此,在燕大所编的《上古史讲义》只成了《帝系考》的一部分;《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卷一期)即是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此后为了预备作《王制考》,改开了《尚书研究》一课,一篇篇地教读,借它作中心而去吸收别方面的材料。”这个庞大的《古史考》系列,也就是顾颉刚先生心目中全面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因此这部《讲义》又只成了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古史考》虽然未能作成,但他提出的《帝系》、《王制》、《道统》和《经学》四考,确是抓住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中心,是他深邃、宏伟的构思,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后人继起考辨古史传说有参考意义。他自己也说:“将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一定有本国的同志起而继续之的,我很愿他参考我的计划。”

任何重要事物的研究,从开始提出疑问、设想,到最后解决,往往要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考辨古史传说的问题同样如此。所以顾颉刚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又说:“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这句话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凡是会过去的只有一时的风气;……所以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会有人继续写的,只有问题到了合乎事实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像《伪古文尚书》一案,才没有人会浪费精神去写,这是我敢作预言的。”无论作任何研究,考辨材料的真伪、时代及其性质,总是基础工作。因此古史传说的考辨工作如顾先生所说的还要长期做下去。

此书最后三章,曾在刊物上单独发表过:第三十二章《孔子家语五帝篇》,曾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

的扫除工作》的篇名刊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北京大学潜社的《史学论丛》第二册；加了一个“前记”，并改写了第一段。第三十三章《后期的三统说》，曾用《三统说的演变》的篇名刊于一九三六年三月的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后面有童书业的一篇跋，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编；第三十四章《潜夫论》，曾用《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的篇名刊于北平研究院的《史学集刊》第三期，童书业也加了一篇跋，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编。

这部《讲义》，燕京大学曾油印发给听“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的学生，由于印数少，很少流传。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几次大劫难，留存下来的更少。《第二学期讲义序目》油印本未刻印，后来发表在《古史辨》第五册，这次据以补入，并核对了顾先生的手稿，但为了便于翻检，没有按原来的顺序置于第二十六章之前，而是移置于书首，并将“序”和“目”分开，第一学期讲义序，改为“自序一”，第二学期讲义序改为“自序二”，两个学期讲义的目合在一起，接着通排。书中每章原来都仅有数字顺序而没有章名，这次整理时都据目录增加了章名。

顾先生的这部《讲义》的手稿保存了下来，整理时据手稿改正了油印本刻印的差错。后来顾先生在油印本上又作了一些增订，也照着改正。引文的差错，则核对原书改正。

王煦华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自序一

本学期的讲义编到这里，已快放寒假了，只得作一个小结束。趁这个机会，请让我把编讲义时的意见与计划陈述一下。

中国的古史，为了糅杂了许多非历史的成分，弄成了一笔糊涂账。汉以下的学者从事整理的虽很多，但这些材料太乱了，没法摸出一个头绪来，不得不各自用了主观去定取舍，分前后。但这样地定了，分了，在每个人的本书里看去似乎已很整齐，很清楚，而在古史的全体中则反而加增了一层混乱，使得于原来的糊涂账之外更添出一笔新的假报销来。因为这个缘故，二千年来谈到古史总是没办法。倘使我们再用了他们的方法做下去，所得的结果不过在已失败的古人之后更照样地失败一次而已。

只有司马迁和崔述，他们考信于《六艺》，凡《六艺》所没有的，他们都付之不闻不问。这确是一个简便的对付方法。但《六艺》以外的东西并不曾因他们的不闻不问而失其存在，既经有了这些东西，难道研究历史的人可以闭了眼睛不看吗？况且就是《六艺》里的材料也何尝都是信史，它哪里可以做一个审查史料的精密的标准呢？所以他们的不信百家之言而信《六艺》，乃是打破了大范围的偶像而崇奉小范围的偶像，打破了小势力的偶像而崇奉大势力的偶像，只挣得“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资格罢了。

我们现在受了时势的诱导，知道我们既可用了考古学的成绩作信史的建设，又可用了民俗学的方法作神话和传说的建设，这愈

弄愈糊涂的一笔账，自今伊始，有渐渐整理清楚之望了。但是这件事太大，牵涉到的问题太多，决不是几个人在短时间内所可穷其究竟的。

前数年，我曾研究了这方面的几个问题，又把若干篇讨论文字合成一册《古史辨》。因此，社会上以为我是专研究古史的，就有几个学校邀我去任中国上古史的课；我只有逊谢。这因担任学校的功课必须具有系统的知识，而我仅作了些零碎的研究：试问图样未打，模型未制，如何可以造起渠渠的夏屋来呢！若说不妨遵用从前人的系统，那是违背了我的素志，又是不愿意干的。

民国十六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到的时候已开课了，功课表上已排上我的“中国上古史”了，而且选课的人也选定了。这一急真把我急得非同小可：这事当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得自编讲义而专印材料，把许多人的零碎文字钞点出来，约略组成了一个系统。那时所印的材料分作五种：

甲种——上古史的旧系统，以《史记》秦以前的本纪、世家为代表；

乙种——《史记》本纪、世家所根据的材料及其他真实的古史材料（其实这两类不应合在一起）；

丙种——虚伪的古史材料，古代的神话传说与宗教活动的记载；

丁种——古史材料的评论；

戊种——豫备建立上古史新系统的研究文字。

这样地教了一年，搜集到的材料不能算少，但自问把这些材料系统化的能力还差得远；而且范围太大，一个人也不能同时注意到许多方面。所以第二学年开始的时候，就改讲了别种功课。

本年到燕京大学来，也同中山大学一样“中国上古史研究”的

课目早公布了。幸而我有了以前一年的豫备，不致像那时般发慌。但前年编的是些零碎材料，没有贯穿的，又以粤校印制方便，故可充分点印，现在则不该如此，亦不能如此了。计划的结果，拟就旧稿改为较有系统的叙述。后来想，前年分作五种，只以先读《史记》致然；现在则分作三编就够了。这三编是：

甲编——旧系统的古史；

乙编——新旧史料的评论；

丙编——新系统的古史。

因为有此计划，故讲义的首页便写作“甲编”；并拟在甲编中分作夏前和夏后两部分，故以夏前部分写作“甲编之上”。那时计算时间，每一编只占到两个月多，这“甲编之上”只可讲一月馀，所以我竭力地把篇幅节缩，起首数章写得很简单。

不久，看见本校陆懋德先生所编的《中国上古史讲义》，他是专从信史一方面讲的，类于我拟编的丙编。我想，那很好了，我在新系统的古史方面既无切实的把握，又幸有陆先生在前，我乐得藏拙了。于是拟专讲旧系统，去掉丙编，又以乙编中评论旧史料的话合于甲编，另以三代制度史作为乙编，而为：

甲编——三皇五帝的来源，简名为《帝系考》；

乙编——三代制度的来源，简名为《王制考》。

这因旧系统里，虚伪的史事丛集于帝系和王制两类之中：三皇五帝，人和事都不真；三代文物，则人虽真而事多假。如能把这两种问题作成较有系统的说明，对于审查旧史料之道亦可谓思过半矣。我于是想把“甲编之下”也搁着了（这方面的伪史不多，和三皇、五帝材料的质量相差太远，不讲也不算缺典）；既无“之下”，自然这“之上”二字就可涂掉了。

可是过了些日子，事实又逼迫我变更计划了。三皇五帝一问

题的讲义，开头固甚简单，但后来忍不住了，渐渐地放手了；开头每章只写几百字的，到近来每章都成一万字了。这样的下去，到这一学年之末不过把甲编讲完而已（如纬书、道书、刘歆、王肃、《河图》、《洛书》、《皇极经世》、《外纪》、《前编》、《路史》、《绎史》等等都是很大的题目，如不赶紧，恐怕到这一学年之末还讲不完呢），哪有余力再写乙编。若说节省字数，又觉得这个问题牵涉太多，如不收集本证旁证，一一加以说明，怕要看不明白，即使看得明白也无以能坚诸君之信。而且我们这一课定名为“研究”，大可借着讨论史料的真伪问题使得它研究化，正不必但以灌输常识了事。所以现在的决定，连这“甲编”两字也删去了。

至于原意放在乙编中讨论的问题，如分州，封国，建官，制爵，改正朔，易服色，封禅，巡狩，赋税，丧服……等等，拟于下学期每星期三的一小时里在黑版上写些出来。

我编辑这份讲义的宗旨，期于一反前人的成法，不说哪一个是，哪一个非，而只就它们的发生时代的先后寻出它们的承前启后的痕迹来，又就它们的发生时代的背景求出它们的异军突起的原因来。我不想取什么，丢什么，我只想看一看这一方面的史说在这二几千年之中曾起过什么样的变动。《老子》云：“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又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这便是我使用的方法。我想，待到它们的来源和变动都给我们知道了之后，于是它们在史实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推翻，而在传说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建设了。这是我的研究这门学问的大目的，而这编讲义乃是个造房屋的草图。

七年前，我和刘揆藜、胡堇人两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时候，曾说：

我想把胸中所有的意见详细写出，算做答文，与两位先生讨论下列诸项问题：（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与夏有没有

关系？(3)禹的来历在何处？(4)禹贡是什么时候做的？(5)后稷的实在如何？(6)尧、舜、禹的关系如何？(7)《尧典》、《皋陶谟》是什么时候做的？(8)现在公认的古史系统是如何组织而成的？——以上的题目当在一二月内做毕，登入《读书杂志》。(《古史辨》第一册 97 页)

不幸这八个题目我只做了(1)、(2)、(3)、(5)、(6)五题，《读书杂志》已停刊了，刘、胡诸先生也不再和我讨论了。我自己又因感到这剩下的三题(《禹贡》一题，《尧典》、《皋陶谟》一题，古史系统一题)内容太复杂，搜集的材料愈多而不易解决的问题也愈多，不敢轻于下笔。到今六年，永远是一笔顿在心头的债。加以衣食所驱，人事所困，数年来得不到一个澄心研虑的环境。每念这三个问题是不是终无作答之望，为之焦躁欲绝。自来本校，在国学研究所中提出“《尧典》、《皋陶谟》、《禹贡》之著作时代”一题，得蒙通过，快慰无量。又在史学系中担任此课，所编讲义即是说明“现在公认的古史系统是如何组织而成的”一个问题。到本学年之末，这个问题当可得到一个粗略的结论了。再过多少时候，《尚书》中首三篇的著作时代又可研究出些结果来了。七年前许下的愿有了还愿的时期，怎不使我距跃三百！

这份讲义是我亲手编的，我当然知道里边的种种缺点。现在写了出来，俾便诸君讨论，也便我将来的修改：

其一，是多寡的不均。这便是上面说的，起首数章太简单了，有许多应收进的材料不曾收进(如讲《诗经》时未把周代金文作比较)，有许多应指出的时代背景不曾指出(如《孟子》称尧、舜为帝，这帝字和战国时势的关系怎样，文中未讲)，有许多应作说明的不曾说明(如《尧典》中的羲、和四宅，巡守四岳，九官出身等等)。

其二，是先后次序的不合。《天问》一篇应移前，《吕氏春秋·十

二纪》中的五帝应移后，已在讲义中提及了。但尚有未提及的，如《尧典》，其中言定时成岁，言封禅巡守，皆是秦、汉间的大问题；又以“群牧”与“群后”连言，使郡县制和封建制同时存在，也是很显明的汉代事实。这篇书实应移后，与《五帝德》等并肩才对。

其三，是漏举了许多书籍。《尚书》中除了首数篇外固然讲到夏前历史的很少，但《吕刑》中说着“三后”（禹、稷、伯夷），作者的古史观念还与《诗经》相似，应当列于《诗经》之次。又如《墨子》，它里面说的古史虽没有新奇之说，但它喜讲尧、舜、禹、汤，与儒家的古史观念很相像，亦应列于《论语》、《孟子》之间（墨家的学说固在孟子之前，但《墨子》这部书结构整齐，立了题目发挥，似出于《孟子》以后）。又如讲驺衍的“大九州”学说以前，应将为大九州的基础的“禹之九州”先说一下，故《禹贡》亦应列入；讲驺衍的五行学说以前（或以后），应将为五行说宗主的《洪范》说明一下，故《洪范》亦应列入。又如讲《庄子》的“快乐在古代”的学说时，《老子》一书也该列入，以其中把“善为道者”属于“古之圣人”，又言“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它的古史观念与庄子相一致也。

其四，是分别部类的有疑问。此编以儒家为中心，故分为“儒家以前，战国的儒家，战国、秦、汉间的非儒家，西汉的儒家”四部。这是因为汉以后的古史为儒家所统一，遂以儒家为主而对于汉以前的纷纷之说作如此的分划。但这个界限并不严密。例如驺衍这人，以前是无疑地放在阴阳家里的，董仲舒这人，以前是无疑地放在儒家里的，但我们既已懂得了他们的学说“斟酌划一”之后，我们还能支配他们一列于儒家，一列于非儒家吗？如果把驺衍改列儒家，则承袭他的学说而又态度不明的《吕氏春秋》应入何家，便成一个疑问。又如《世本》，它自己本没有说是哪一家，我因它为《史记》所采用，就放在儒家里，也觉得不安。我很想不分家派，一律以时

间先后定次第,但如果这样,在思想的系统上又不分明了,而且能把著作时代考得确定的有几部书呢。所以将来修改时究应如何排列,尚须费去一番斟酌的工夫。

以上四项是我自己指得出来的缺点。还有自己指不出来的缺点,如论断或落于主观,以致有武断及深文周纳之处,又如引用材料或有错误,以致所作的记载有不合事实之处,这都待诸君的严正的批评了!

顾颉刚

十九,一,三。

自序二

这一学期所讲的,是我们的古史中的一个最大的症结。这个症结自从发生以来,大家莫名其妙地在信奉,就是对它怀疑的人想要攻击它,也因各方面的材料都给弄乱了,寻不到一个头绪,无法下手。攻击既不可能,于是编起古史来,虽明知它是荒谬,也不得不依声学舌,照钞一遍。

一方面,又因帝统即是道统,而道统是国性国本之所系,所以这一个系统就成了国家的功令,伦理的中心,有不信的就是离经畔道,该在诛灭之列。因此,即使有人能想出方法去解开这个症结,但在专制时代也是不敢做的。

因为有这两个原因,所以从王莽时代直到清代,这一千八百年之中,这个破绽甚多的系统却能安稳地维持下去,统一所有的历史书。

不幸清代是一个整理古文籍的时代,什么古书都要研究,把它们的本子问题弄得一天比一天清楚。这样一干,许多伪书及真书中窜伪的部分就露出马脚来了。书籍的著作时代既成了学术界中的重大问题,则书籍里边纪载的古代史事自然联带发生了问题。到了十八世纪之末,崔东壁先生(述)便把战国以上的书和战国以下的书分成两组,作比较的研究。结果,他指出战国以下的书里所述的古代史事的无数误谬,说明它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造伪的方式。他做了一部《考信录》,对于古史作彻底的考究,去其妄而存其

真。他的考信的工具是孔子的经，因为这些书出得早，保存的原来样子多。凡不合于经的，即为百家杂说，不该信它。但是经中所记的古史本不很多，如何能把百家杂说一一量度了呢？所以他又收取了次一等的材料进去，即是解释经书的传记和羽翼经书的诸子。他这个工作做了四十年，把东周以上的历史完全审查过了。这是一次大清理，自从有了这个症结之后所不曾有过的清理。

可是，我们在这半年中所讲的症结，是经学极昌盛的时代所发生的，故这些病菌蔓延在百家杂说里的远不及其蔓延在经和传记里的多。崔先生是信经的，经以外是信传记的，所以这个系统虽被他打了几拳，但没有中着要害，仍无碍其生存。

又过了一百年，到十九世纪之末，康长素先生（有为）起来，大胆作《新学伪经考》，把经传中的一部分也排除出去，这才鞭辟入里，打碎了这个系统。这固然是他的成功，但若没有他以前的一班汉学家和今文学家专力把汉代经学的派别一一理清，把久已忘记了而今、古文问题重新提起，则他也不能获得这个大发现。原来汉代的经学因发生时代的先后，及其发生时代的社会需要，分为今文和古文两大宗。今文方面，本来没有统一过。古文一派，则在刘歆的学术和王莽的政治的指导之下，自成为一个系统，与原有的经学为敌；这原有的经学就被名为今文。古文一派为适应时势的需要及攻击今文家起见，不但自有其经说，亦且自有其经书，这些经书比了今文家的，除了文字异同之外，又往往有所增益，这就是他们的伪作品。康先生既特为一书，阐明此义，于是往常看一切经传同在孔子的意旨下的，到这时便发生了大问题。而崔先生所谓“考信于《六艺》的”《考信录》中所收的材料是否为真正的信史，自然也发生了问题了。